

# People

## 民建中央副主席辜胜阻： 两会四大热点经济问题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在民主党派领导人中,辜胜阻建言立论、观点独到。他的人生经历丰富,研究领域广泛,十分重视调查研究。在20世纪80-90年代,辜胜阻曾在美国、日本、德国数个知名大学进修、访问,1998年后,他又先后担任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和全国政协委员及常委,2008年3月,辜胜阻又以民建中央副主席的身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内务司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在最近的10多年里,辜胜阻在民营企业转型与经济发展战略、高技术产业与风险投资、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等许多经济社会热点问题上,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向国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

两会前夕,在民建中央办公楼里,辜胜阻接受了《上海证券报》记者的专访,深入分析了当前我国经济社会中的几个重要热点问题。

### 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 离不开风险投资与创业板

辜胜阻对风险投资问题的认识和研究始于1997年3月,是我国较早进入该研究领域的学者之一。当年全国政协大会期间,辜胜阻受原民建中央主席成思危的委托,开始关注风险投资的发展。借助于在美国研修的机会,辜胜阻实地考察了硅谷地区,对美国的股权投资进行了广泛研究,并搜集了许多第一手材料,这为日后辜胜阻全面而深入探讨风险投资和高技术发展战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09年初,中国风险投资人和创业企业期待已久的创业板终于有了眉目,种种迹象表明,创业板有望在2009年推出。作为中国风险投资事业和高技术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与推动者,辜胜阻对中国最近10多年的风险投资事业的发展也颇为感慨。

目前推出创业板的条件已基本成熟。”辜胜阻表示,1998年民建中央向全国政协九届一次会议提交《民建中央关于加快发展我国风险投资事业的提案》,成为当年的政协一号提案,正是从那时开始,我国风险投资事业掀起了第一轮热潮,同时促进了中国风险投资的发展,带来了中国新一轮创业高潮,也培育了一批发展较快、实力较强的本土风险投资企业和风险投资者。

许多专家在谈到创业板推出时,往往只强调创业板作为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环,为风险投资资金提供了退出渠道。但在辜胜阻眼里,创业板不仅仅是多层次资本市场的一环,创业板能否成功,还关系到国家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和创业型国家建设。辜胜阻多次强调,由于风险投资在高新技术产业化过程中具有市场筛选、产业培育、风险分散、政府导向、资金放大、要素集成、激励创新、促进合作、降低成本、更新创新观念等功能,自主创新战略的实施,离不开风险投资和创业板。”辜胜阻把“风险投资”和“创业板”比作一对孪生兄弟,这对孪生兄弟的发展关系到了国家战略。

对于创业板的推出,辜胜阻强调要明确服务定位。他表示,创业板的上市条件不是主板或中小企业板市场门槛的简单降低,既要注意企业的资本规模和盈利条件,更要兼顾企业的成长性,给更多具有发展潜力的创新型中小企业机会。同时,要注意研究创业板与中小企业板、主板之间的差异性,避免“此涨彼落”的现象发生,实现各板块市场并行不悖地发展和繁荣。

作为中国风险投资、创业板和创业战略的重要推动者,辜胜阻始终强调监管的重要性,“一方面要使创业板起到促进高科技企业和初创企业发展的作用,允许资本规模较小、经营持续时间较短、成长性较高的企业上市,另一方面又要对投资者负责,不能让素质太差的企业上市。在上市条件、交易规则、保荐人资格和责任以及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等方面,实施更加严格也更加透明的监管。对于违规市场主体给予及时、公开、严厉的惩处,这是促进创业板健康运行的重要保障。”

辜胜阻还强调了完善市场环境的重要性。辜胜阻表示,从国际经验来看,多数国家创业板的发展并不成功,最主要的原因是投机行为过盛。目前,我国市场经济发展还不成熟,信用环境还比较差,信用体系很不健全,一些投资者并不关注企业的成长潜力和发展前景,而是企图通过企业上市获取“一次性”的高额回报。我们要更加重视发展创业板的市场环境,避免创业板成为“圈钱”的场所或者成为“垃圾”公司的集散地。

### 国家要加快中小城市建设 鼓励农民工就近创业就业

随着世界金融危机愈演愈烈,欧美经济严重衰退,消费需求萎缩,中国制造业也遇到了严重危机,出口加速下滑,许多外向型企业减产、停产甚至破产,大量农民工失业返乡。

农民工就业与农村城镇化问题一直是辜胜阻的重要研究领域。他表示,对于目前的农民工失业问题,国家与社会各界要高度重视,农民工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经济辉煌作出了重要贡献,他们的就业问题不仅仅是经济问题,还是社会与政治问题;就业是民生之本,危机对民生的影响突出表现为大量企业经营困难甚至倒闭而引发的大量失业。美国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的一个重大后果就是奇高的失业率,当时失业率一度超过20%。”

辜胜阻表示,当前我国的就业压力已十分明显,主要表现为以农民工为代表的存量就业和以毕业大学生为代表的新增就业出现了较大困难。目前,农民工失业,并计划招工的企业和空闲岗位同时在减少,据调查,今年春节后计划招工企业的数量与去年相比减少了20%,空岗数量减少10%。也就是说,就业问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

针对这一形势,辜胜阻认为,破解当前的就业压力重在“开源”,即创造新的就业载体,通过鼓励创业来带动就业:改革开放后数亿新增劳动力的就业问题,就是在浪一浪一浪的创业潮中解决的。”

危机是一种很好的倒逼机制。以改革开放初为例,当时城镇失业率高达5.9%,还有数千万知识青年需返城就业,如果没有改革开放初的创业潮,当时的就业问题很难解决。从1979年到1984年,全国共安置4500多万人就业,城镇失业率从5.9%迅速下降到1.9%。”辜胜阻表示,如果没有当时的个体工商户热,这么多新增就业人口很难被吸纳。

创业不仅能够解决自身就业,而且在扩大就业方面具有倍增效应,一人创业可以带动多人就业。据辜胜阻提供的调研数据显示,平均每名创业者可带动就业3.8人。据调查估计,截至2006年回乡农民工已有800万人创业,并已带动3000万人的就业。

辜胜阻认为,政府在推动农民工创业与就业中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与义务,政府工作应把群众的就业和创业作为政府第一工作目标,辜胜阻建议,要为农民工提供免费创业培训,提高农民工创业能力,增强创业意识;要加快创新金融服务,为农民工创业提供创业资本;要强化创业服务,尽可能降低创业门槛;要进行财税扶持,使农民工创业成本最小化;要创建各类创业园区,营造农民工创业的良好小环境。

辜胜阻还强调,农民工返乡创业就业,并非是让农民工回到乡村,而应加快中西部中小城市建设,将中国许多县城建成拥有10-30万人口的小城市;目前多数新生代、新生代农民工已习惯在城市生活,让他们的绝大多数人回到乡村,重新从事农业生产已不大可能。让他们留在长三角、珠三角这样的经济发达地区工作,生活成本又太高,而发展县城经济,可以减少农村宅基地散而乱的土地浪费,可以带动内需,可以加速农业产业化、规模化,还可以让大量农民工过上城市生活,完成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辜胜阻表示,将县城建设成中小城市早已有成功案例,如浙江、江苏和珠三角的许多经济较为发达的县级市政府所在地或城关镇,就已成为人口达10-30万人的中小城市,少数城市甚至已拥有30-60万人口。而这些由县城发展起来的中小城市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就是改革开放30年来大量农民在县城创业,以创业带动就业,以创业实现城市化。以浙江义乌为例,这个原本县城只有2万人口、耕地资源严重稀缺、交通并不方便的浙中内陆县(现为县级市),能发展成拥有60万以上城区人口的中等城市,就是农民创业成功的结果。

改革开放30年里,东部沿海地区崛起了一大批中小城市,许多农民通过创业成了市民,过上了较高品质的生活,这样的成就在中西部地区也能实现,目前各方面的条件也已基本成熟。”辜胜阻认为,如果政府在中小城市建设与农民创业上提供一系列的优惠政策,无疑将加快农村城市化步伐,也有利于扩大内需,刺激经济增长,早日走出世界经济危机的困境。



### 应对全球危机 需要政府强力扶持中小企业

这次世界金融危机中,许多国家的金融大鳄、跨国巨头首当其冲,遭遇严重冲击。但中国受金融危机影响最深的却是中小企业,特别是出口型的制造业中小企业。

在辜胜阻的工作生涯中,中小企业问题一直是其重要研究课题,他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正因为这些经历,辜胜阻对目前中小企业遭遇的困境感同身受。

辜胜阻表示,我国中小企业为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中小企业创造的国内生产总值占60%,上缴税收占50%,就业人数占75%,进出口总额占69%,开发新产品占82%以上。中小企业在繁荣经济、促进增长、增加就业、扩大出口、推动创新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已成为推动中国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关键。

尽管目前中小企业面临的经营危机主要是因为出口陷入困境,但辜胜阻表示,危机背后还有更深层次原因。

尽管中小企业的贡献很大,但却普遍遭受不公正待遇。辜胜阻在调研中发现,由于我国中小企业与民营企业基本上重合,因而中小企业在贷款时不仅受银行等金融机构的“规模歧视”,还受“重公轻私”的所有制歧视。这种双重歧视使得中小企业只获得了全国贷款总额的10%-15%,政府补贴的不到5%。除此之外,中小企业的税费负担却在不断上升,调查数据显示,2003年我国中部地区私营企业交费支出平均值为22.9万元,西部地区为36.9万元;到2005年两项数据分别上升到了26.6万元和39.4万元。

为了让中小企业早日走出困境,辜胜阻认为,政府需要采取多重措施扶持中小企业发展:要积极扩大内需,拓展中小企业产品的国内市场;要实施对中小企业的各种税费优惠,适时、适当地降低税负;要健全担保风险的分散、补偿和激励机制,完善多层次的信用担保体系;要放松金融管制,引导民间资本发展中小银行,让中小银行支持中小企业融资;要积极构建支持中小企业的融资体系,拓展中小企业的直接融资渠道;要帮助中小企业转型升级和实施产业转移,推进中小企业二次创业。

### 预算民主是人大民主基石 政府投资计划应受人民监督

每到“两会”时,政府财政收支问题总能引起热议。今年由于4万亿投资计划的实施,8500亿医改方案的颁布,十大产业振兴规划的提出,每一项都需要巨额政府财政资金的投入,政府财政预算更是成了今年两会前夕社会公众与舆论的热点焦点问题。

辜胜阻认为,舆论和社会公众关心财政预算问题并不奇怪。政府的收入和支出预算本来就应遵循民主原则。政府所有的收支行为都应置于人民的监督之下,按照人民的意志和要求,公平合理科学地进行配置。

辜胜阻表示,当前,健全人大的预算监督和审查制度,推进预算民主需要从多方面入手:

首先是要实现全口径政府预算管理,强化预算的完整性。辜胜阻表示,当前,包括社会保障收入、土地收入、国有资产收益等大量的预算外资金和制度外资金存在破坏了预算体系的完整性,导致政府资金使用缺乏统一性,形成“预算之外有预算、制度之外有制度”的管理格局,强化了部门利益,弱化了规范的监督管理,加重了社会经济负担,还为重复建设、挤占挪用、腐败浪费等行为提供了条件。为此,需要在建设和完善公共财政体制过程中,通过将预算收入纳入预算、建立社会保障预算等措施,完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加强金融国有资产管理,建立覆盖整个政府收支的预算体系。

除此之外,辜胜阻认为,还要提高预算管理的约束力,强化预算刚性;要完善预算管理和监督体系,强化预算的透明度。要探索建立向社会公众定期、定期公布详细的预算信息的制度,扩大广大纳税人对预算管理的知情权,使他们能够充分了解、讨论、监督预算,提高预算的透明度。建立一套完整的预算报告、审查、听证、审计、评估、问责和处罚制度,在预算编制、执行和监督各环节形成权力制约和平衡机制,构建人大、政府、社会公众共同参与的多层次的预算监督体系。



■对话

## 治学要标新立异 为政需求同存异

◎本报记者 朱国栋

在接受本报记者专访时,辜胜阻反复强调调查研究的重要性。辜胜阻表示,无论是作为经济学家治学,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为政,还是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始终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

《上海证券报》:最近10多年里,您一直身兼两种以上的身份,既是学者,又是政府官员、民主党派领导人,还担任过全国工商联的副主席,您对这样的工作经历有何感受。

辜胜阻:在我从政的10多年来,先后担任了武汉市副市长、湖北省副省长、全国工商联副主席、民建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等职。不同的领导工作岗位对我提出了全新的考验,如何运用经济理论指导当地发展、如何实现学者与官员双重角色的互补,始终是摆在我面前的一个课题。地方政府工作特别是全国工商联和民建中央参政议政平台对我的学术研究提供了一个难得的“社会实验室”,使我的研究能够更紧密地与实践结合在一起。

通过理论指导实践和在政界、商界的平台上坚持调查研究,实现“政”“学”互动和双赢。我在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研修近4年,在大学做了14年教授,在地方政府工作了8年,到北京全国工商联专职工作近两年,到民建中央和全国人大也已工作一年左右,这种多样化的工作经历使我有跨政界、学界、商界的优势。

《上海证券报》:您认为治学、从政有什么区别和联系。

辜胜阻:两者最大的差别是:治学要标新立异,而从政要求同存异。但两者的最重要的共同点是都要有调查研究。无论是学术研究,作为地方政府官员作决策,还是作为民主党派领导人参政议政、建言立论,都不能离开调查研究。

和一些坐在图书馆里搞研究的学者不同,由于亦官亦学的身份,我可以到更多的企业和基层去做实地调研。研究成果只有服务于现实,为政府决策提供参考意见,学术研究才有其价值和生命力。

在作为地方政府官员时,我坚持用在学术研究和实践调研基础上所形成的思想和观点指导所主管的工作,一些调研成果已转变为政府决策与社会实践;在作为民主党派的中央领导人、全国政协常委和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期间,我依托学术研究成果,围绕民营经济转型与国家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改革与社会发展、农村城镇化与农民工就业、科技创新与教育发展等社会经济热点问题参政议政、建言立论,向国家提出许多重要建议,其中一些建议被采纳。

《上海证券报》:您为何如此重视调查研究呢?

辜胜阻:只有充分的调查研究,才能作出有预见性的判断,提供准确而科学的建言,作出正确的决策。

《上海证券报》:最近这段时间,经济学界对最近1年多的宏观调控政策有一些不同的声音,我们注意到,早在2008年初,您就主张更多用财政政策应对通胀压力。

辜胜阻:这样的主张就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的。

根据我的调研,当时影响物价的通胀压力是外部输入型和成本推动型的,也就是说,当时的物价上涨主要是成本推动,用从紧的货币政策能否取得好的效果有待观察。我当时就指出,当务之急是加大财政政策的配合力度,以降低农产品生产和流通成本、扩大供给为基础,以控制食品价格为核心,加大对家庭和个人转移支付为重点,着力缓解物价上涨对低收入群体造成的生活压力。从紧的货币政策会使本来融资就十分困难的中小企业雪上加霜。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一判断是对的。2008年下半年,我国从紧的货币政策在短短几个月内变成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当初没有过于依赖从紧的货币政策应付通胀压力而加剧中小企业困境,在面对世界金融风暴袭击时,我们本来可以更从容一些。